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張伯苓全集

龚克主编

經始尚乞  
王文俊 梁吉生 周利成 副主编

賜予設法指撥庶可早日興工相應函請即希

鑒核此上

天津市市長張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第一卷 著述 言论（一）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本卷主编

本卷副主编

张兰普

梁吉生

南開大學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張伯苓全集

鮑克 克 主編

王文俊 梁吉生 周利成 副主編

惟予惟獨可向所傳工燒製於工事利物茲  
為子設議相授意可早日與工相應函請即寄

經始而已

賜予設議相授意可早日與工相應函請即寄

聖核此上

天津市市長張

第一卷 著述 言論（一）



南開大學校長張本卷副主編

本卷主編 梁吉生  
张兰普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伯苓全集：全10卷 / 龚克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310-04920-2

I. ①张… II. ①龚… III. ①张伯苓(1876～1951)  
—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8522 号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60×185 毫米 16 开本 237.25 印张 164 插页 5500 千字

印数：1—3000 套 定价：100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 《张伯苓全集》编委会

主任 龚 克 孙海麟 张元龙

副主任 朱光磊 梁吉生 孙克强

委员（按拼音排序）

崔国良 董润平 方 昶 胡光明

罗世龙 马跃美 荣 华 孙 苗

田祥平 熊 勇 杨文杰

主编 龚 克

副主编 王文俊 梁吉生 周利成



20世纪初的张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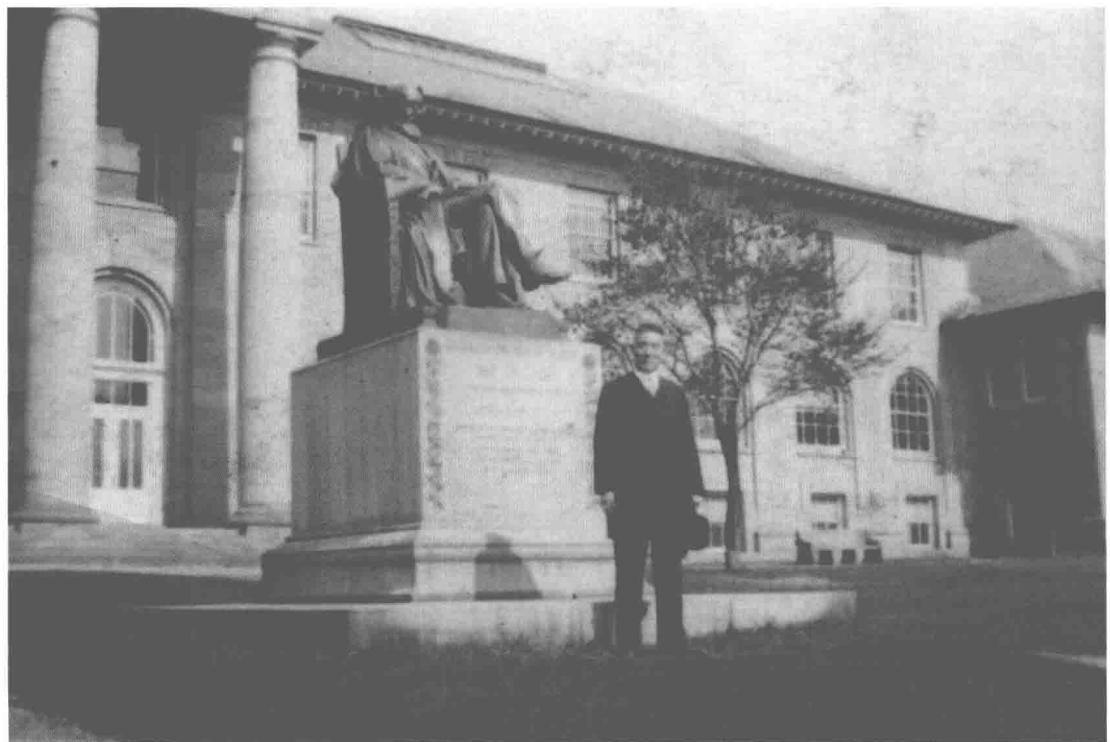
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志学会社编辑出版的《星期报》，载张伯苓《雅典奥运会》演讲内容



1914年，南开学校的校刊《南开星期报》创刊



1912年7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  
图为张伯苓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1917年秋，张伯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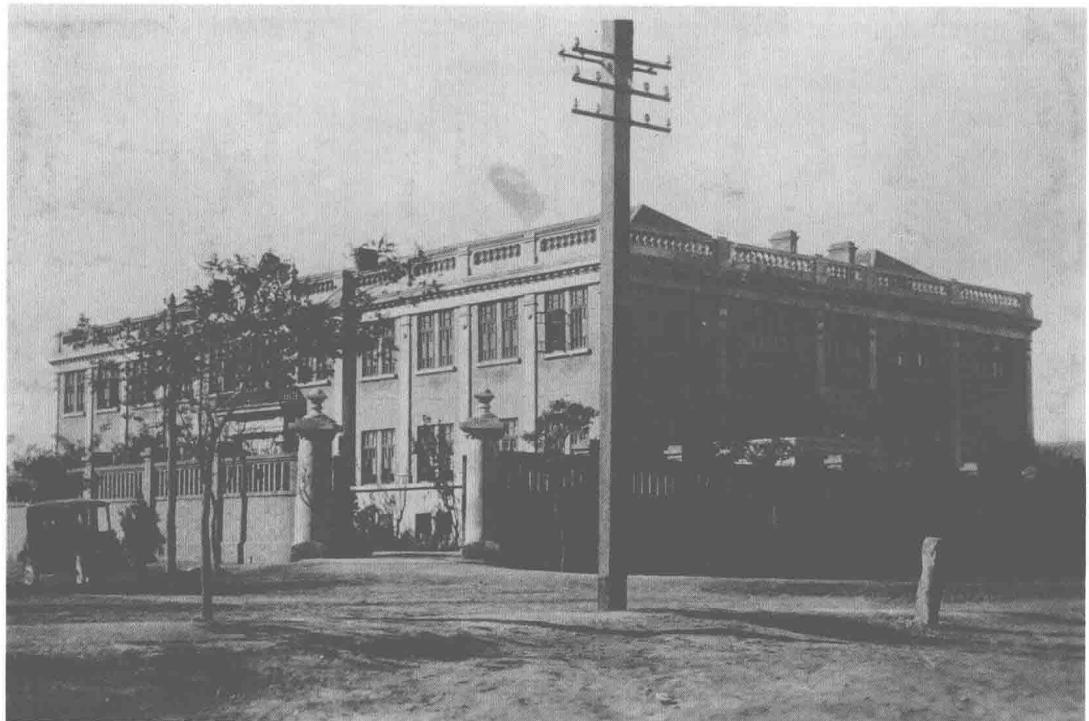
1919年春，严修与张伯苓赴南京筹集南开大学创办经费，与当地人士合影



《敬业》第一号封面



《校风》第一期封面



1919年，南开大学最初的校舍



1921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张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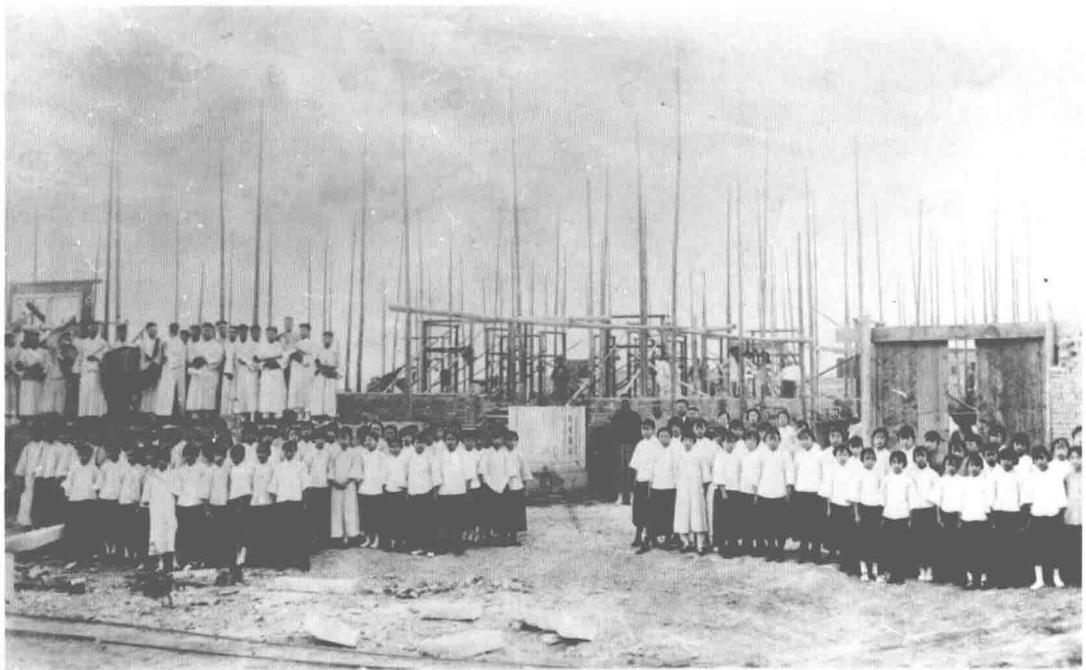


1920年10月，南开大学矿科董事会在北京召开，张伯苓与众人合影留念

14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午後二時董事會常會在大學部開會	
到會者	范靜生先生 蔣夢麟先生
	嚴憲約先生 孫子文先生
	卞微成先生 陶孟和先生
校長	張伯苓先生亦列席
一校長提出本次會議應解決之問題四項	
一	李秀山督軍遺捐之基金至今尚未交到當如何
催促	
二	南開附近地畝其在中學門前者已為私人所有不能獲
	到矣其在校南者曾往詢問尚無辦法
三	女子中學應附屬於中學或大學或獨立

1920年12月12日，南开学校董事会常会会议记录



1925年9月，南开女中奠基仪式留影



20世纪20年代，张伯苓对南开学校童子军演讲



1926年，南开女中外景



1929年秋，张伯苓与来津进行友谊赛的上海两江女师篮球队队员合影

# 学习和继承张伯苓先生的爱国精神

(代序)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噏，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要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熏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作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就是这股劲儿，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  
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  
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  
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  
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  
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这是1946年6月9日在旅美南开校友庆贺张伯苓荣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补祝七十寿庆的会上，由老舍和曹禺合作并共同朗诵的贺词。这首贺词，亦庄亦谐地勾画了这位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教育家的形象，他就是代代南开人永远敬爱的张伯苓校长。

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生于1876年4月5日。那时中华民族处于日益寇深祸

亟的灾难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赔银割地，丧权辱国。值此中华民族经历千年未有之大难与大变的历史关头，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寻求救国救亡的道路。1889年，13岁的张伯苓报考北洋水师学堂，希图强国。在水师学堂，张伯苓不仅学到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受到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严复的思想影响。可是，当张伯苓即将毕业要上舰实习时，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他到残存的通济轮上实习，亲睹了“国帜三易”，即1898年日本将威海卫交还中国，降日旗升龙旗，然而转天清廷又转交英国，再降龙旗升英旗，致使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6年10月17日）自那时起，张伯苓历经劫难、矢志不渝地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南开教育，义无反顾地践行教育救国之宏志。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构建起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始称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2年成立南开女中，1928年成立南开小学，1931年建立经济研究所，1932年建立应用化学研究所，1936年成立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蜀光中学，张伯苓以南开系列学校为依托，开创并践行公能教育，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周恩来等一大批民族英彦辈出南开，书就了爱国育才的光辉篇章。

爱国，是张伯苓为人与办学的最为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特点。他说：“南开学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6年10月17日）张伯苓认为，“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当日多在造成个人为圣为贤，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张伯苓《以社会之进步为教育之目的》1919年2月12日）

爱国，就要立为公之志向。张伯苓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为公之道德和为公之诚信。他说，“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1916年1月19日）他问学生及其家长，“将来是为国？抑为私？来宾中或有诸生之家长，必以为供给子弟十数年之费用，今日毕业后，宜略为家庭打算。但试问若无国，何能有家”？“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张伯苓《为国为公，傻做实做》1935年6月23日）他又说，“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一以是为标

准”，“望诸君明征学理，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既深知之，即力行之”。（张伯苓《作事应以“诚”字为标准》1916年6月28日）张伯苓要培养的是“真诚、无私的领导者，使他们能够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张伯苓《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奋斗》1918年1月14日）张伯苓坚信，“如果公，如果诚，事就能成功”，“南开的目的是对的，公与诚是有力的，干”！（张伯苓《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的精神》1934年9月17日）

爱国，就要有“能力”。张伯苓说，“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便可实现救国之宏愿”。（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张伯苓讲的能力，包括学习的能力、研究的能力、团结合作与组织能力、写作说话能力、实干做事能力等等，统括为“为公服务之能力”（同上）。张伯苓特别注重“引导学生之自动力”（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1916年1月19日），他说，“余尝为汝等计划，约有二法：一为先生之辅助；二为诸生之自治。夫然后先生之力渐减，学生之力日增，庶几人人皆有自治之精神而有作事之能力也”。（张伯苓《欲强中国，端赖新少年》1916年8月30日）曾任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的黄钰生先生指出，“在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自动、自觉、自治、自主、自创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五自’的每一个‘自’，都是一种能力”。（黄钰生《〈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序》1984年）

爱国，就要强健体魄。重视体育是张伯苓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即以重视体育，为国人倡，以期个个学生有坚强之体魄，及健全之精神。……但苓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张伯苓早在1907年就提出“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张伯苓《雅典的奥运会》1907年10月），从而成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之第一人。

爱国，就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在1927年就指出，“以往之大学教育，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影。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即偶尔相合，亦不过无源之水，一吸即涸，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中国将长此

拾人之余矣。故南开大学之志愿，在谋学术之独立，在整理事实，以为建设之根据，在用科学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简言之，在‘认识中国’，在‘服务中国’。根据此项原则，故南开注意研究中国国情……以为建设根据，又能培植此建设之人材，则其心愿固已足矣”。（张伯苓《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1927年）针对日寇觊觎我东北的大陆政策，张伯苓认识到东北是中国的命脉，在南开成立了东北研究会，从1927年到1929年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南开双周》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还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发表了如《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东北现在的交通》《东北社会情形及教育设施之概况》《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日本之中国研究与中国之日本研究》《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日本政党及最近各政党之现状》《中日俄与东三省》等一大批研究成果。调研成果还构成了著名的《东北地理教本》（1931年秋刊行，2015年重印出版），这本长达600多页的教本，以详实的数据揭露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罪恶行径，警告国人“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爱国，就要团结抗敌。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伯苓坚决地与全国人民一起发出了“最后的吼声”。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日，张伯苓即在津发表《吾人之责任与自救之道》的讲话，表明爱国态度。1932年，张伯苓参与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并任常委，又在南开召开天津各界参加全国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确定“不与内战者妥协，不参加内战，不供给内战用款”等方针。（见1932年7月21日《大公报》）1933年，他与南开师生一起积极支持与援助长城抗战。在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任裁判长，南开学子亮出“毋忘国耻”、唤醒国人“收复失地”，致日本代表离席而去，而张伯苓先生拒不向日本代表道歉，成一时佳话。在“一二·九”等抗日运动中南开师生均是中坚力量，他们走出学校、走出天津，南下沿途宣传抗日，产生了巨大影响。国民参政会是在中共提议下组建的战时民主机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1938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两园桃李一手栽”（陶行知语，指国共两党中多有南开学生）的张伯苓被遴选为参政员并任副议长。张随即发表谈话称“参政会之目的，乃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盖中国今日之局势，非全国共同一致奋斗，不足以挽救危亡。”（1938年6月18日《新华日报》）